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 及其意义

万海松

根基主义（又译作“根基派”，“土壤派”，“土壤主义”）是19世纪出现在俄国知识界的一个思想流派。“根基主义”一词是俄国人的独创，它源自俄文的“根基”（又译作“土壤”，“大地”，“乡土”）。“根基”的引申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人民、老百姓、民间；第二层更高的引申意义是指俄国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

根基主义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斯拉夫派思想中某些陈腐的观点和不切实际的因素，同时也指责西方派思想无视俄国现实，认为西方派企图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激进思潮和盲动举措，来达到腐蚀俄国、使俄国失去独特性，并最终让俄国沦为他国和他族的臣民和奴隶的目的，根基主义反对在当时的俄国已呈泛滥之势的虚无主义等激进主义思潮，认为这些都是非俄国固有的异己思想，主张知识分子立足于俄国本土

和国情，呼吁在尊重、保护和发扬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态度，力图克服西方文明中已经出现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希望知识分子和贵族接近人民（即“根基”），团结人民，从人民那里汲取艺术的养料和生命的价值，将俄国和俄罗斯文化建设成一个可供世界各国、各民族借鉴和学习的样板。持有这种认识或者与之思想接近的文化人，一般就可以被称为根基主义者。

严格意义上的根基主义者，主要是指出版人兼作家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弟弟、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创办并存在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两个杂志《时代》和《时世》的编辑部同仁，除了陀氏兄弟，还包括文学评论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作家阿波罗·迈科夫等人。其中，思想理论贡献最大的根基主义者当属陀氏兄弟、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根基派所有思想家的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体现出的共同倾向，才能被看作是根基派的思想。但是，如果将根基派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将根基主义思想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肯定会不可避免地抹杀或掩盖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特点。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他和其他根基派思想家存在众多互不影响、殊途同归的相似看法，但其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也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以下略举几端。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根基”包含两个层面的

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普通百姓；一是作为抽象的精神实体的俄国民间文化，主要是以信仰和仁爱精神为主的东正教文化。作为实际存在的客体，根基主要包括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市民、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普通百姓。在 1878 年写给几名大学生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大学生们存在蔑视人民的心理，他说，商人也是人民：“先生们，现在你们自己与知识界的所有报刊异口同声地把莫斯科居民称作‘卖肉的’。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卖肉的算不了人民？这就是人民，名副其实的人民，米宁就是卖肉的。”（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31 卷第 1 册，第 23 页）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出生和生活在城市，纳入他思维范畴的根基主要是精英阶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以外的城市各阶层。正如俄国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对人的发现》一文中所指出的：“人民的、农民的生活的静止状态，它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引起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的注意。他是描写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来自小官吏和小市民阶层的人民的作家。在人民的生活里，主要是彼得堡市民的生活里，在脱离了人民之根基的公民的灵魂里，他揭示了独特的发展变化，发现了人性的本质的边缘。……引起他兴趣的是具有强烈的根基主义情结的人们，是大地的人们，过日常生活的人们，忠实于具有根基特色的、日常生活传统的人们。”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时期也的确接触过很多来自农村的农民，也把他们看作根基的一部分，但在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大多数著述中，他们并不是主体，作为其议论和文学描绘对象的仍然主要是城市的底层人物。而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无论其出身平民还是贵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都是知识分子的主体。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很多情况下，贵族基本上等同于知识分子，有时还与以沙皇为核心的统治阶级相提并论。

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根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他早期的作品来看，他笔下的来自根基的小人物基本上都是完美的，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窘困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使他们高尚的心灵和美好的品质有任何变质或褪色，他们那熠熠闪光的品德，让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周围环境，乃至整个社会顿时黯然失色。在这些尽善尽美的形象身上，读者能够隐约感受到他们作为中坚、榜样的力量。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论争和周围现实之认识的加深，他不再过于美化这些来自根基的小人物，而是尽可能立体地描绘他们，在指出他们永不泯灭的美德的同时，也用各种细节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缺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数次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来自根基的、具有榜样力量的典型人物。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认为，一部分根基有缺点和腐败，并不代表整个根基或者大部分根基已经变质，因为根基的整体一直是完好的，人民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东正教文化的精神基础，因此，他始终对人民的力量充满信心。

第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知识分子有能力担当人民领路人的角色，不过他们容易受异己思想的淫惑而暂时迷失方

向。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与人民一体的，由于一时偏信异己思想，他们也许会暂时脱离人民，不过，暂时的脱离反而有助于他们之后的回归，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往往要在少年阶段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终身受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如《少年》中一个非专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尽管您描写的全是混乱和特殊的事，只要写得真诚就行……这样的札记至少保留着一些真实的特色，使人借此推测出在那混乱时期有的少年心中可能藏着些什么想法，了解这些不能说毫无意义，因为不管哪一代人都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少年》，文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15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主体的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承认或者说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层，或者不妨说，他认为整个俄国都是一个阶层。波兰学者拉扎里就认为：“对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来说，俄国不存在作为阶级的农民或资产者。他没有注意到俄国的阶级斗争。”（拉扎里：《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圈子里、根基主义》，俄文版，第73页）从某种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将理想当成了现实，有阶级调和论的影子，但这也正符合他在小说和政论中反映出来的一贯追求：知识分子既能与人民融为一体，又能胜任人民领路人的角色。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彼得大帝改革及其对俄国之影响的想法，也与其他根基派思想家存在较大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斯拉夫派等一味对彼得之前的俄国大唱赞歌，而对彼得大帝及其改革的历史功绩基本否定，其实是无视历史真实，因为

“在彼得之前的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时期，谎言和虚伪是够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文论》下，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75页），况且彼得大帝的改革瑕不掩瑜，功不可没，其全部事业的意义在于开拓了眼界，让俄罗斯获得了“自我意识”，即认识到俄罗斯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和使命，尽管彼得改革只是触及了俄国的贵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利益，并没有到达人民的最底层，只是使得贵族暂时脱离了人民（比如，彼得大帝制定的《官秩表》的颁布），并未伤及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元气。要改造人民很困难，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彼得的毛病就在于急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果两百年不到的时间只是触及皮毛而未伤内脏：人民只是看到改革败坏了风气，改革并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总体上说，人民与彼得改革前毫无二致，彼得改革反而使得俄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自己的身上蕴藏着任何地方再也没有的珍贵财富——东正教，基督的真理，而且是事实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作家日记》上，张羽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说法，俄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不需要斯拉夫派刻意去恢复，因为它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俄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桩桩风起云涌的事件让各种思潮在俄国的历史舞台上轮番演出，程度不同地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的担忧。当后来人回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包括根基主义在内的许多思想时，似

乎能切实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用各种方式阐述它们时的忧虑和迫切心情，因此也不能不佩服这些思想的前瞻性和普适性。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尽管也是一种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观点进行调和的立场，但试图在寻求“第三条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斯拉夫派的主张过于保守，脱离俄国现实，指责斯拉夫派流于形式的和不切合实际的言行，同时也批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俄国根基和俄国本土文化的腐蚀和入侵。为了俄国的现在和将来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俄国东正教文化中寻求可以抗击异质文明和异己思想入侵的力量，主张对西方物质文明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认为俄国文化一定能理解并同化西方文化，并使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基本上没有破坏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只是强行把知识分子和人民隔离开来。鉴于知识分子是接受外来思想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那些被异己思想所迷惑因而一时飘浮在空中、在俄国土壤找不到立足之地的知识分子，呼吁这些知识分子尽快结束飘浮状态，回归人民的根基，从他们那里吸取为艺术和为人生的营养，希望知识分子胜任人民领路人的角色，带领全体人民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文、史、哲相互代言、互不分家的 19 世纪俄国的思想氛围中，作为思想家型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还在俄国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自俄国文学在 18 世纪崛起以来，几个具有社会思想史意义的问题一直是俄国文学无法逃避的主题，比如，其中最常见的“谁之罪”“怎么办”等问题。从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发表于 1792 年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开始，俄国文学就形成了描写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传统。小人物的穷困出身和悲惨遭遇在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之后，往往还能引发读者对小人物之所以命运悲惨的追问：这是“谁之罪”？应该“怎么办”？当然，不同的读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由此，以描写小人物遭际和表现小人物美德为主题的作品，作为一股势不可当的现实主义潮流，涌进了俄国文学。在普希金发表了《驿站长》（发表于 1831 年）之后，以小人物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俨然成为俄国 19 世纪文学的主流。

1812 年，俄国遭受拿破仑的入侵，全体人民奋起反抗，在战争后期，一部分贵族军官在将拿破仑部队赶回法国的征途中，真切地观察了欧洲社会，认识到了俄国和欧洲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在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后，他们返回了俄国，以这部分贵族知识分子为主的各种小组开始建立起来，知识界研究俄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兴趣越来越浓，终于酝酿了 1824 年 12 月发生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不久，俄国文学中就出现了描写“多余人”的作品。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5 年开始陆续发表）被认为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表现“多余人”形象的作品。随着莱蒙托夫和赫尔岑等人的传承接力，描写“多余人”也成了俄国文学的一个重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了俄国文学的特质，而且在于他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领域，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对“小人物”和“多余人”主题的开创性继承。他的贡献在于继承和发展了这两个主题，并以自己对这两个主题的独特阐释和表现，用小说和政论的方式，解答了困扰俄国文学很久的“谁之罪”和“怎么办”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和解答方式，体现了他将思想和文学完美结合的非凡才能，更反映出他的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他那里，小说中的小人物是根基的代表，体现了根基的力量和价值；“多余人”是那些热衷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已入歧途或正在迷途中的西方派，他们之所以在俄国的土地上显得多余，是因为诱惑了他们的那些思想跟俄国和俄国人民格格不入，使他们迷失了道路，于是他们脱离根基，肉身和灵魂（俄罗斯思想）分离，成了在故土上漂泊又无所皈依的人。那么，造成知识分子迷失和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元凶是谁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来自欧洲的异己思想。它一方面直接损害了知识分子，使他们感觉在自己的祖国无事可做，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分子间接地造成了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因此，知识分子和小人物都是异己思想的受害者。就这一点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论文《食古不化与明达事理（论文之一）》（发表于1861年）最有代表性。它在论述第一部“多余人”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说：“奥涅金的怀疑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某种悲剧成分，并且有时还具有刻薄讽刺

的意味。在奥涅金身上，俄国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或者至少是开始感觉到，他在人世间无事可做。他是欧洲人：他将为欧洲带来什么？欧洲是否还需要他？他是俄国人：他将为俄国做什么？他还理解俄国吗？奥涅金这一典型恰恰就应该首先在所谓的俄国上流社会形成，这个社会脱离根基最为严重，它表面的文明已经发展到最高程度。”（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第11页）

那么，面对这种已成事实的局部损害和或将呈现蔓延之势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先自救，然后才能救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必须回归根基，在根基处吸取抵御异己思想入侵的养料，产生抵御引诱和防止被腐蚀的抗体，然后，再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人民领路人的责任，与人民一起，借助根基的力量反击异己思想，并将其逐出祖国，同时将俄国文化建设成为一个不但可以抗衡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欧洲文化，而且可以作为世界典范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独特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在不容乐观的现实的重重包围之下，他有点急切，有时急躁，急于想把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变成现实，以至于模糊了现实和理想的界限，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度夸大俄国人和俄国文化对一切外来文化的理解能力和包容性，将民族主义具有健康意义的凝聚力，转变成令人反感、使人担心的进攻性。在公然宣扬俄国文化至上、俄国人肩负着解放世界的使命同时，其根基主

义思想开始具有走向极端和反动的危险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80 年发表的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之中。这种论调也为后来的泛斯拉夫派和极端根基派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将近一百五十多年来的俄罗斯，其根基主义思想愈益成为俄罗斯探寻改革道路之争中无法忽视和值得倚重的思想资源，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作为俄罗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显然有了解的价值和必要。而在目前专著浩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说研究界，尚未见有“陀学”专著按照根基主义思想的发展线索来专门梳理和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种文本。因此，对他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的根基主义思想进行爬罗剔抉，是进行初步认识和深层次解读的基础。在目前的俄国，新思想层出不穷，许多思想往往把自己的源头追溯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里寻找支持自己思想的资源。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纯思辨哲学领域，还大量地出现在文学领域。在苏联时代风靡一时的“乡村散文”热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那里找到源头，它们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新时代的再生和复活。再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其思想和批判激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而被很多论者誉为“20 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时代的这些新思想和文学作品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对作为根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把握。

其次，根基主义思想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各种论断的一条主线，是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把重要钥匙。以往的研究界从心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当然是一些比较容易引出创见的研究视角，但是往往不能囊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有些解读后得出的结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里适用，在另外一部作品里就显得十分牵强。因此，以偏概全或者顾此失彼的情况，往往不可避免，这似乎是这些研究视角与生俱来的缺憾。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弑父情结”的解读。从根基主义角度进行的解读尝试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虽然是俄苏学界已经用过，并且直到如今似乎也没有被完全弃用的解读方式，这是一种统摄性的视角，关注的是一条能穿行于各种领域的思想主线，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上述的遗漏和缺憾。而原来那些从这个角度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成果，一直就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简言之，一是只从非小说作品中解读，而缺乏对小说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关注；二是研究结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要么给予毁灭性的批判，认为它一无是处，斥之为反动思想；要么就尽可能地规避，乃至美化其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大师身份不相称的某些极端主义论调。相比之下，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视角，在利用他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进行相互参证的同时，如果对上述缺点有意规避，还是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住那些政论、小说以及介于小说和随笔之间的作品中的根基主义思想的。

再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对认识中国晚清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和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启蒙”的争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哲学内涵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争论，其实就是直觉认知和理性认知的争论。直觉认知的主要特点是注重信仰和情绪，而理性认知高举的是理性和科学的大旗。因此，俄国的两派之争就关系到俄国在信仰（东正教文化）和理性（欧洲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文化相对成熟和民族历史相对悠久的国家来说，大多数有思想的文化人不可能做出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是采取调和的折中主义立场。俄国的根基派就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代表，而作为根基派代表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又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凭借其广播世界的知名度，他在俄国文学，乃至文化界中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也给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文化争论提供了较具代表性的鉴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界也爆发了启蒙主义和国粹主义的论争，所涉及的也是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的取舍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展开的关于“科学与启蒙”的思想辩论，同样关乎如何对待这两种文明的问题。以鲁迅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文人，最终还是采取了对两者不偏不废的文化立场，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因此，在鲁迅看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借

鉴西方近代文化，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基础。“鲁迅所以强调‘拿来主义’，是因为十分自觉地想要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间，有所澄清，有所裂变，有所调整，有所融合，有所革新，一句话是要立足于自己原来的华夏这片思想文化土壤上，建设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就只能是‘拿来主义’，‘占有，挑选’，而绝对没有可能实现‘全盘西化’。”（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这种将借鉴作为“化为我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是调和执着两端的极端派的第三条道路，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所以，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对我国知识分子在面临此种文化论争时采取何种立场，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和启发价值。

最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能为国际的“陀学”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陀学”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们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价值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角度新颖、立论可靠的成果，为国际“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研究的诸多方面，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文学和思想大咖的根基主义思想，既有诱惑，又有挑战性。